



看长江中游文明形成与发展从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 陶 洋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九亩堰、大禾场、土地山和杨湾等10余处地点为一体的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屈家岭遗址面积约284万平方米，距今约5900—4200年，是研究探寻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

实证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屈家岭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揭开了长江流域特征鲜明的史前文化面纱。经过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发现，屈家岭遗址所处史前文化时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以粟作为辅的农业经济结构。虽然屈家岭先民还保持着采集栎属、枣属、柿属、芡实和菱属等野生植物的习惯，但成熟的稻作农业已然成为支撑人群生活的主要物质基础。稻作农业在屈家岭遗址各史前阶段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粟和黍所占比重极小。遗址发现国内已知最早的高温黑釉陶，将我国高温黑釉技术提早了将近1000年。而残留物分析表明，遗址出土的陶杯与壶形器和先民的饮酒行为具有直接关联。此外，近年的考古工作，确认屈家岭南部台地存在以大型“宫殿式”建筑F38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高等级建筑区。建筑F38面积约510平方米，平面整体呈东北至西南向，自北向南分为四间，南端向西折出一间，依据建筑形制及特征，推测其为一处公共礼制性建筑。遗址还发现多组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

遗址出土的大量史前稻作遗存、蛋壳彩陶和磨光黑陶，以及高等级建筑区和诸多水利系统等，不仅表明这里是长江中游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也说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呈现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文明的壮美图景

近年来，考古队会同勘测和水利学等领域的专家，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经过系统勘探和多地点解剖，新发现多组水利系统。其中，对熊家岭、郑畈两处水利系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工作。

以熊家岭水利系统为例，该水利系统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溢洪道和灌溉渠系等，是已知构成要素最为齐备的史前水利系统。水坝坐落于青木垌河东一西向支流的河道上，土筑而成。其东侧为蓄水区，与自然岗地合拢面积约19万平方米；西侧为灌溉区，约8.5万平方米，植物考古的研究工作显示该区域存在史前稻田。溢洪道位于蓄水区的北部缺口处，出口北抵青木垌河中上游，呈南高北低的走势，将自然分布的基岩面用作溢洪道，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学建设理念。

水坝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早期坝的迎水面上沉积出淤沙层，其上有包含细小烧土颗粒与炭化杂草种子的灰土层。晚期坝叠压着灰土层，表明作为晚期坝“起建面”的淤沙层上曾荒草丛生。先民在对其进行烧荒处理后扩建水坝，应发生在秋冬季的枯水期，符合“农闲时节兴修水利”的行为逻辑。早晚两期坝体堆积明显经过人工拍打、夯实或加固，局部位置显露出因拍打、夯实而形成的“痕迹面”。两期坝体的各层堆积中，绝大多数掺有禾本科植物根茎，应属原始的“加筋工艺”。此外，在早晚两期坝体堆积物中发现“草裹泥”的痕迹。而在熊家岭水利系统的溢洪道入口发现大范围自然分布的泥质页岩基岩面，基岩面的中部存在南北向沟状下切迹象，推测人为对基岩面进行了平整和加工，以便宣泄洪水。同时在溢洪道进口的基岩面上，发现一些明显往出口方向（南向北）倾斜的页岩板，应为宣泄洪水时水流冲击所致，是溢洪道使用的直接证据。

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再现了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文明的壮美图景，水利系统集抗旱与调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这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

展示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路径与方式

考古工作表明，屈家岭遗址先后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史前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文化序列完整、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也反映了中华文明连续性这一突出特性。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三个重要阶段，油子岭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源头，石家河文化则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距今5300年前后，勃兴于华中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开启了快速扩张，北上随枣，南下洞庭，西进峡江，首次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纳入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油子岭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屈家岭，面积约38万平方米。至油子岭文化中晚期，发展形成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共四处地点为一体的大型遗址，确认了水利系统、墓葬区、居住区和陶器生产区等，分布范围约105万平方米，发展为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聚落。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态、先进的快轮制陶工艺和磨光黑陶生产技术，生动展示了油子岭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发展面貌。

距今5100年左右，屈家岭遗址所在的汉东地区率先从油子岭文化嬗变为屈家岭文化。至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规模急剧扩大，由105万平方米扩展至284万平方米，社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遗址发现大型水利系统、高等级建筑区、墓葬和铜矿石等遗存，探索到史前稻田的分布范围，出土已知最早的高温黑釉陶。庞大的聚落规模、缜密的水利系统、独特的建筑工艺、成片的高等级建筑，反映出屈家岭遗址作为“壕堰式”聚落的典型特征，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与大型城址同级的新型中心聚落形态，是展现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

距今约4900年，屈家岭遗址迈入石家河文化时期，发现了铜矿石等重要遗存，为探索史前矿冶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

总之，屈家岭遗址先后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史前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持续进行的考古工作，总体上较为清晰地展示了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路径与方式。（作者系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17、18世纪英法荷对拉丁美洲的殖民掠夺

□ 韩 琦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几乎实现对拉丁美洲的完全殖民垄断，攫取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其他资源。英法荷等后起工业发达国家不甘心让西班牙、葡萄牙独占美洲财富，都试图打破这种垄断。特别是到17、18世纪时，它们通过殖民占领、海盗私掠、走私贸易和全球争霸战争，不断在西班牙、葡萄牙控制地区进行殖民掠夺，最终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了经济主导地位。它们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同参与了对拉丁美洲的掠夺，加深了拉丁美洲人民的灾难和痛苦。

成立专门的殖民公司实现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占领。英法荷三国成立的殖民公司通常由国王授予“特许证”，并被赋予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如英国伦敦公司和皇家非洲公司、法属西印度公司、荷属西印度公司，都承担了殖民地的运营、贸易和扩展任务，成为殖民掠夺的主要工具。

荷兰人在1621年成立了西印度公司，负责加勒比海和大西洋沿岸的殖民活动。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巴西西北海岸，以开发那里的蔗糖种植园和巴西木。1624年占领巴西的巴伊亚半岛，1630年占领了伯南布哥，控制了当地的蔗糖生产和奴隶贸易，但最终在1654年被葡萄牙人赶出巴西。同时，荷兰人还先后占领了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库拉索、阿鲁巴、博内尔以及圣尤斯特斯等岛屿，在这里发展种植园经济和从事走私贸易。

法国人在1664年成立了西印度公司，在加勒比地区先后占领圣巴泰勒米、圣文森特、多米尼加、马提尼克、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和圣多明各等岛屿，在南美洲正式建立圭亚那殖民地。由于发展大规模奴隶种植园经济，圣多明各成为“安的列斯群岛的明珠”。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圣巴泰勒米等岛屿，也发展了类似的经济。

英国人夺取了其他西印度群岛。1655年，牙买加落入英国人之手，巴巴多斯、百慕大、安圭拉、圣基

茨、托尔图加、安提瓜、尼维斯、巴布达和多巴哥也相继落入英国人之手。他们还在中美洲海岸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如拉古纳德特米诺斯群岛、伯利兹、巴伊亚群岛、马伊斯群岛和莫斯基蒂亚群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安德烈斯岛，并与荷兰人共同占领圭亚那。

利用海盗和私掠船抢夺财富。在同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殖民掠夺争夺过程中，英法荷三国都利用海盗和私掠船攻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船，掠夺财富并削弱竞争对手的经济力量。在早期阶段，英法荷三国尚无实力与西班牙、葡萄牙抗衡，于是海盗和私掠船在殖民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海盗通常分为普通海盗和私掠船海盗，后者由政府授予私人船只“私掠许可证”，允许其攻击敌对国家船只，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私掠者。

海盗活动在16世纪就不断发生，17世纪大量增加，到18世纪20年代衰落。荷兰海盗皮特·海因在1628年劫获了一整队的西班牙运银船，为他和荷兰西印度公司获得1500万荷兰币的巨额财富，海因也因此被任命为荷兰海军中将。仅在1623—1636年这13年间，荷兰海盗就抢劫了550艘西班牙船只。1668年英国海盗亨利·摩根从牙买加出发，洗劫了波托贝洛港。3年后又率队焚毁了巴拿马城。让·巴特勒·莫因则是著名的法国海盗，后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以私掠船征服了尼维斯岛。

依靠走私瓦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垄断。随着拉丁美洲地区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加，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英法荷三国将加勒比岛屿作为贸易枢纽，投身到罪恶的涉及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三角贸易”之中。同时，西班牙实施垄断贸易制度，只允许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贸易，禁止殖民地与外国、殖民地之间相互贸易。高额关税和关税导致走私活动日益猖獗。

走私是指未经殖民当局授权将货物带入美洲殖民地的非法活动。从17世纪中叶开始，走私贸易兴起，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走私贸易泛滥。根据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英国享有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输入黑奴30年的专利，并被允许每年派一支不超过500吨的船只到巴拿马地峡的波托贝洛港从事贸易。与此同时，西欧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英国、荷兰的制成品更为物美价廉，从而为其从事走私活动敞开了大门。走私贸易主要是用欧洲的制成品（包括武器、奢侈品）和非洲奴隶换取美洲的贵金属、蔗糖、烟草、咖啡、皮革等产品。荷属库拉索、圣尤斯特斯、英属牙买加、巴巴多斯，法属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殖民地都是走私贸易的中转站。

通过全球霸权战争改变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地位。殖民地是大国竞争的延伸，几乎每场欧洲的大规模战争都涉及它们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拉丁美洲也成为它们争夺全球霸权的重要舞台。

欧洲列强之间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极大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英法荷三国通过战争削弱了西班牙、葡萄牙的影响力。战争结束后，荷兰成为新的海上强国，法国崛起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力量，英国则通过其海上优势逐渐崭露头角。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优势，这些国家纷纷将目光投向西班牙、葡萄牙声称拥有却未加有效控制的拉丁美洲地区。

17世纪中期，爆发了三次英荷战争。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之后的《布雷达和约》规定，荷兰放弃对位于今纽约的新荷兰的要求以换取苏里南。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之后，《乌特勒支和约》确认了英国对牙买加和其他殖民地的控制。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之后，英国用哈瓦那换取了法国的整个佛罗里达。此外，法国还将格

林纳达、圣文森特和多米尼加割让给英国。在1802年的《亚眠条约》中，西班牙将特立尼达割让给英国。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圣卢西亚割让给英国。圣卢西亚曾经历14次易主，多巴哥也经历12次易主，殖民地不断易主的背后是拉丁美洲被殖民、被掠夺境况的不断恶化。

英法荷三国在拉丁美洲的殖民掠夺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要的影响是在加勒比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建立了高度依赖黑奴劳动的种植园经济。为弥补当地劳动力不足，三国从非洲贩入黑人奴隶，将罪恶的奴隶贸易拓展至加勒比地区。进一步扩张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让西方殖民者赚得盆满钵满，却给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导致了加勒比地区经济结构的单一性，长期制约着当地经济健康发展。此外，大西洋奴隶贸易改变了加勒比地区的人口结构，使该地逐渐发展出一个由少数白人殖民者控制、大量非洲裔奴隶劳动力支撑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而从拉丁美洲的殖民化进程来看，时至18世纪晚期，拉丁美洲已经完全处于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绝大部分土地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小部分土地尤其是加勒比地区被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占据。西方列强通过奴隶贸易和掠夺矿产等手段攫取了巨大的财富，为西欧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本原始积累。其中，英国更是通过控制加勒比海重要岛屿和航线，最终确立了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海上霸权。

（作者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



秘鲁汉学家吉叶墨：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传播

□ 王晓阳

拉丁美洲知名汉学家、秘鲁天主教大学东方研究中心教授吉叶墨（1929—2023年），是西班牙语美洲较早将中国古典诗歌直接翻译为西班牙语本土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浓厚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吉叶墨出版了20余部汉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历史文化与哲学思想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他也因此于2016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将中国古典诗歌直接翻译为西班牙语。吉叶墨的汉学研究是从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开始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班牙语美洲的中国古典诗歌多转译自英法译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诗歌韵味的流失与变异。吉叶墨为打破这种转译惯例作出了重要贡献。来华后，钟情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他开始借助字典来对唐诗进行“解码”。1996年，吉叶墨在秘鲁首都利马出版了第一部汉西双语译作——《白塔·唐诗选集》，在西班牙语汉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为西班牙语读者直接领略唐诗意蕴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本。在1998—2005年期间，他还先后编译出版了包括李白、张可久、杜甫、白居易、王维、陶渊明等中国古代诗人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作品集。

吉叶墨的中国古典诗歌译作具有典型的文献性特征。通过前副文本与后副文本的耦合使用，这位秘鲁汉学家将自己的译作置于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之中。为向西班牙语读者更为清晰、全面地传递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背景，在每部译作开头，他都会以编年体将诗人的生平事迹进行勾勒，并对诗人诗歌书写

特征进行总结提炼。为符合西班牙语读者的阅读喜好，他还按照西班牙语诗歌的习惯，将诗人的作品依据不同主题来进行划分。在《笔林·杜甫诗选》中，他将选取的150首杜甫诗作依次划分为“同情”“风景”“友情”“传记”“自然”“反思”六个主题；在《酒泉·李白诗选》中，则将李白的150首作品划分为“友情”“风景”“爱情”“酒”“战争”五个主题。此外，为还原诗中语境，吉叶墨还巧妙运用后副文本，将正文中无法直叙的中国历史典故、风土人情等信息以尾注的形式向读者娓娓道来，大大降低了西班牙语读者的阅读障碍。由于其中国古典诗歌译介的开拓性与文献性，吉叶墨及其诗歌译作在整个西班牙语汉学界都大放异彩。正因如此，近年来西班牙易贝里昂出版社又将吉叶墨的七部中国古典诗歌全部进行了再版。

向西班牙语世界呈现中国古典文学的全貌。除译介中国古典诗歌外，吉叶墨还尝试以系统、多元的方式向读者呈现中国古典文学的全貌。1996年秘鲁天主教大学出版了两卷由其编译的《雕龙：中国文学选集》，“旨在向西班牙语读者呈现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全貌”。在为选集作序时吉叶墨指出，他期望这部文学选集可以成为读者了解中国文学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开胃酒”。因此，他首先向读者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并从几个维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特征进行了提炼总结。

《雕龙：中国文学选集》分32章，每章以文学题材或小说名命名，覆盖了包括先秦散文、楚辞、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题材作品。在每一章节开头，吉叶墨都会对章节名（如《神话》《易经》《诗经》等）在汉语语境下的释义进行跨文化解读，并借此介绍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知识。在一些以小说命名的章节（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他还会对小说作者生平、故事梗概、人物形象等进行剖析。这种编译方式对于提高中国文学的可读性与易懂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有着重要意义。

在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构之时，吉叶墨文学选集的编写原则明显不同于中国编写传统，且各文学题材的选编也未至均衡。但作为西班牙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整体图景的初次展现，《雕龙：中国文学选集》使得西班牙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了较为清晰完整的了解，极大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

推动中国文化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在中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意识到“是时候出版一本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图书了”。在1990年出版的《来自中国：迷人的之境》中，他详细阐述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中国国内一些重要的风土人情、名人逸事与民间传说，该书为拉美大陆了解万里之遥的中国提供了更为直观可信的视角。

为向西班牙语读者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93年，吉叶墨与西班牙语学朱凯联合翻译并出版了《秋之扇·中国成语》。2002年，他还编译了《勤劳蜜蜂·中国谚语一千条》。在书中，吉叶墨用西班牙语将中文中常用的谚语、成语、歇后语

等进行了跨文化阐释，使得中国谚语中所蕴含的智慧逾越了横亘在中西双语之间的文化鸿沟，进而引起了读者的文化共鸣。2013年，吉叶墨又通过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百科全书》。在书中，他选编了650个中国文化词条，并以西班牙语字母将其排列。每个词条附有中文与拼音，内容覆盖中国文学文化、历史宗教、节日习俗等多个领域。此外，吉叶墨还对对中国历史颇感兴趣。2014年，由他本人与洪弥云联合翻译出版的《史记选》是《史记》的首个西语译本，对于西班牙语汉学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文本。

吉叶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推崇备至。在被问及如何看待被某些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时，吉叶墨指出，中国从未欺侮其他国家，中国的作为体现了大国应有的担当。根据他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了解，中国并不会成为一个侵略与主宰其他国家的国家。他还提出，中华文化中蕴藏着深厚的“文明平等论”思想，“三人行，必有我师”便是例证之一。

吉叶墨将中国视作他的第二故乡。回到秘鲁后，他几乎每年都会返回中国为自身汉学作品的创作寻找文献材料。2023年1月，吉叶墨在利马溘然长逝，但其汉学著述在推动中国文化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推动中拉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